

如何辨析“日本右翼”

王 屏

[内容提要] 对日本右翼的深入了解不仅是研究日本政治的需要，也是我们把握中日关系发展动向的需要。近年来，由于右翼势力不断地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更应加大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研究力度。与西方相比，日本的右翼势力构成复杂，思想主张繁多。单就右翼组织内部来讲，战前有“国粹派”、“革新派”“侠客派”之分，战后有行动右翼、新右翼、宗教右翼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右翼组织之外，出现了一批右倾文人与右派政治家（其中不乏右翼政客）。他们对日本社会以及日本政治外交的影响远远超过右翼组织，甚至直接左右着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论是合理的民族诉求，还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我们都必须及时地把握其政治思想与治国理念。本文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组织构成与思想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客观地界定了“日本右翼”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关键词] 右翼组织 右倾文人 右派政治家 战后日本政治三次右倾化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室研究员、哲学博士

没有哪个国家的右翼能像“日本右翼”那样引起中国人如此的高度关注，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右翼能像日本右翼那样构成复杂、表现多样。如果能深刻地辨析日本右翼的结构特征，并且为“日本右翼”进行准确的概念界定与客观、系统的科学阐述，对于我们正确地解读日本社会，特别是及时地掌握“右翼势力”对日本政局以及中日关系走向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日本，所谓“右翼”单指“右翼组织”，不包括“右倾文人”和“右派政治家”。但现实中，右倾文人和右派政治家在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远大于右翼组织。在中国，很少有人对日本右翼的构成进行精细的分析，都是将这三者笼统地称为“右翼”。本文使用“右翼组织”、“右倾文人”、“右派政治家”三个概念将三者之间加以区别，并在整体上称之为“右翼势力”。

一、右翼组织的结构特征

何为“右翼”？在政治光谱中，“右翼”一词是相对于“左翼”而存在的。在法国大革命后的议会例会中，坐在议长左方的是激进的雅格宾派，坐在右方

的是保守派。自此以后，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激进派就被冠以“左翼”称呼，而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等具有保守特征的派别就被冠以“右翼”称呼。中庸的议长成为名义上的存在，政治在左右冲突中进行，胜者掌握权力。然而，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左右两翼都是少数派。“近代操纵日本政治的是在左右两翼之间寻找平衡的自由主义派别。他们有时斩杀极右而倾向于右；有时斩杀极左而倾向于左。正如战前统治日本的不是右翼一样，战后统治日本的也不是左翼。只不过从整体上看，战前偏右、战后偏左而已”。^①不过，这种态势在冷战结束前后的日本发生了重要变化。80年代的日本产生了保守派“革新”（指“新保守派”）、革新派“保守”（指社会党）的政治现象，进入90年代后，随着“脱美”思潮的出现，日本社会逐步右倾化。

（一）关于“日本右翼”的概念界定

为日本“右翼”界定概念实非易事。三岛由纪夫认为，“右翼不是思想问题，它纯粹是个感情问题”。松本健一认为，幕末维新时期，左翼表现为开化，右翼表现为攘夷。明治（1868-1911）中期，左翼主张民权，右翼主张国权。日俄战争时期，左翼是非战派，右翼是主战派。从大正（1912-1925）到昭和（1926-1988）前期（战前），左翼主张马克思主义，右翼主张民族主义。战后50~60年代，左翼主张近代主义、容共。右翼主张传统主义、反共。到了20世纪70年，“新右翼”组织诞生。新左翼与新右翼抗衡时，二者在“反体制”方面观点比较接近，但在对待“天皇”的态度上有分歧。新左翼主张连天皇一块“革命”，新右翼则主张实行“文化天皇制”。从表象上看，似乎左翼革新，右翼保守。然而，这既愚弄了左翼，也未使右翼正当化。同样，在西方左、右两翼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因此，吉登斯以《超越左与右》为名著书立说，主张走“第三条道路”。

日本学者堀幸雄这样界定右翼概念“一般讲，右翼没有系统的理论，其指导理念因人而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它首先是对近代的反动，它否定作为人类普遍理念的自由与平等，将国家放在价值中心的位置。现在，基本上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右翼概念来理解。右翼具有狂热的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式的对国家过分的忠诚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视。他们强调民族使命，具有打破现状、发动政变的强烈愿望”。^②日本右翼从不使用“革命”一词，而以“革新”代替之。日本右翼不是在民主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保守势力，而是在与西方对峙过程中、产生于农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要求革新政治的一股反体制政治势力。笔者认为，右翼组织作为一种民

① [日] 松本健一著 《右翼・ナショナリズム伝説》，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95年，第71~72页。

② [日] 堀幸雄著 《右翼辞典》，东京：三嶺书房，1991年，第48~49页。

间政治团体，其思想特征体现了日本社会底层人们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保守与革新的双重性格。它根植于日本社会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又对传统文化进行极端式的解读。

日本传统右翼组织多以反体制、反西方（反近代）为己任，他们强调东方文明，倡导“亚细亚主义”，但同时又大搞“天皇崇拜”、复古排外。他们把“爱国”与“扩张”捆绑在一起，将“兴亚”与“侵亚”混为一谈。他们视反体制和政变为己任，甚至用黑社会的暴力手法制造流血事件。日本右翼不论在近代还是在现代，其主张都无法占据主流地位。因此，日本右翼打破现状的意识极为强烈并往往采取极端手法。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以及过分地崇拜天皇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保守性。

（二）日本右翼组织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特征

日本右翼运动起源于西方列强入侵亚洲以及日本推行“欧化主义”的19世纪70—80年代。盲目“入欧”所带来的价值观的崩溃以及相关的严重社会问题，是促使右翼组织及其右翼思潮产生的历史前提与社会基础。右翼组织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这股“脱亚入欧”思潮产生抑制作用。作为日本社会的底层，右翼组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张扬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停止，尽管其中不乏封建守旧残余。右翼思想的原点或曰右翼的“道统”就是“维新”，正如左翼不“革命”就不能称其为左翼一样，不维新就不能称其为右翼。守旧与维新被装进一个篮子，这种不和谐的交响乐百年来一直被日本右翼演奏着。

作为日本右翼的“道统”，其对外认识建立在与西方列强斗争到底这一基础之上，如果说亚细亚主义者不一定是右翼，那么，右翼人士一般都是亚细亚主义者。右翼的对内认识建立在与腐败的政党、阻碍国民自由与平等的官僚、垄断利润的财阀进行坚决斗争这一基础之上，变革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现行体制、实现亚洲国家的维新是日本右翼的美好理想。可以说，在反体制、反资本主义、主张“维新”这点上，左右两翼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当日本与亚洲其它国家发生利益冲突时，右翼的这些理想便被日本的实际利益所取代，其狭隘性便显露出来。天皇主义、日本主义、三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亚细亚主义是日本右翼的传统思想与理念。在战后初期，日本右翼组织畸形发展，亲美、反共成为其主要特色。这种现象到70年代初“新右翼”组织诞生后才得到适当的调整，“右翼民族派”开始清理右翼的传统思想遗产并亮出“反美”、“反体制”旗号。

1. 战前右翼组织。日本右翼源于幕末明初的“尊王攘夷”运动，位于日本福冈的“玄洋社”是日本右翼的最大源头组织，成为日本右翼团体的鼻祖。明治初期，因“废藩”而失业的武士在福冈藩就达数万人。1878年，箱田六辅、头山满、进藤喜平太等人创办了政治团体“向阳社”，箱田六辅任社长。“向阳社”的政治主张是“同心协力，振奋精神，辅佐国家”，推行“共同博爱主

义”。该组织成为后来作为日本右翼运动中枢的玄洋社的直接前身。1881年2月玄洋社成立，头山满虽然没有任过玄洋社的会长，但作为创始人和顾问，他成为该组织的精神领袖和当然的领导者之一。在日本政府实施“大陆政策”的过程中，玄洋社曾起过“先头部队”作用。玄洋社后来演变为黑龙会、浪人会、大日本生产党、大东塾。

战前右翼组织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国粹派”右翼组织。如：玄洋社（1881）、黑龙会（1901）、赤化防止团（1922）、大日本正义团（1925）、爱国社（1928）、大日本生产党（1931）、国粹大众党（1931）、血盟团（1932）、神兵队（1932）、国体维护联合会（1932）、大日本青年党（1936）、东亚联盟协会（1939）、大东塾（1939）、东方会（1940）、大日本一新会（1942）等。其中，最有名的是玄洋社、黑龙会以及大日本生产党和大东塾。1886年中日“长崎事件”发生后，“玄洋社”告别了民权运动，从此走上了极富扩张主义的伸张“国权”的道路。《黑龙会纲领》是右翼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纲领。其内容有5条：（1）弘扬肇国精神，融合东西文明，以期成为亚洲民族振兴的领导者。（2）除去弊端，实施立宪。（3）改革内政，振作外交，以图海外发展。（4）振作尚武之风，全民皆兵，巩固国防。（5）对欧化之风实施改革，建设源于国体的国民教育基础，提高大和民族的公德良智。^①这是一个全面的政党施政纲领，它全面地反映了右翼组织的政治主张。该纲领集天皇主义、国粹主义、亚细亚主义、军国主义于一身，所涉略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诸方面，是一个系统的有关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宣言书。

二是“革新派”右翼组织。如：老社会（1918）犹存社（1919）、行地社（1924）、经纶学盟（1923）、建国会（1924）、激进爱国党（1929）、日本国家社会党（1932）、新日本国民同盟（1932）、劳动者前卫同盟（1932）、日本劳动同盟（1932）、皇道会（1933）、大日本国家社会党（1934）、勤劳日本党（1934）、爱国政治同盟（1934）、日本政治革新协议会（1937）、日本革新党（1937）、大日本党（1940）等。俄国革命的影响以及大正民主运动的高涨，促使近代日本国民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老社会”由左右两翼的思想家、军人等各种人物构成，是旧式国粹主义运动向新式近代国民主义运动转化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众多国家主义团体，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犹存社”由大川周明、满川龙太郎组织建立并推举当时在上海的北一辉为领导人。1920年年初，北一辉回到日本，并将自己写的《日本改造法大纲》交给犹存社，使之成为该组织的“核心操典”。该社的中心口号是“改造日本帝国，解放亚州民族”。北一辉是革新派右翼组织的代表人物，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主张理想主义色彩浓厚，

^① [日] 木下半治著 《日本右翼研究》，东京：现代评论社，1977年，第57页。

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相比他的思想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三是“侠客派”右翼组织。如：1919年10月成立并号称拥有会员60万的“大日本国粹会”。该会信奉侠客道，以“行动”为原则，总裁与会长相继由政友会系统的人物担任。该会的行动纲领是：（1）以天皇为中心，图民族之统一，探治国之方略。（2）使政治遵侠道、政治家守信义。（3）拯救东亚，履行日本国民天赋之职责。（4）昂扬敬神崇祖之念，善导国民思想。（5）协同劳资共存共荣，稳定国民生活。^①侠客右翼的诞生是大正时期日本右翼发展的一个特色，此类右翼组织当时在日本有几百个，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搞破坏并暗杀社会主义者，恐吓企业，实施政治流氓行为，将右翼组织与暴力团视为同一的风潮就起于此时。大日本国粹会是一个被政友会利用的暴力性团体。1929年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任该会名誉总裁，会长是高桥光威，头山满为顾问。该会宣称尊崇和维持血盟的惯例，会员多由从事土木建筑的工人以及赌徒构成，该会与黑社会组织界限不够分明。

该类型右翼组织的行为方式与战后的“行动右翼”一脉相承，均为疑似家族团体。比起组织原则他们更心醉于某个特定人物，比起理论他们更重视行动。他们跨越合法政治活动的界限而行使暴力，甚至搞暗杀活动。儿玉誉士夫就是日本侠客派右翼的代表，中日战争期间他曾被军部派到中国搞情报收集活动。20世纪60年代，他又整合暴力团组织为日本政府所用，并与政治家来往密切，被称为日本政界的“黑幕”。

2. 战后右翼组织。1927~1937年期间日本的右翼组织共有634个，人数达12万2千人。20世纪3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都非常严峻，右翼组织开始走向极端，从组织到思想均被体制化。右翼的道统不复存在。二战爆发后，右翼组织的活动大量减少。因为一则军部进行思想管制，二则右翼青年都被派往战场。日本战败后，根据盟军司令部的指令，有179个右翼组织被解散，右翼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战后初期右翼组织的活动基本停止。进入50年代后，随着美苏冷战体制的形成右翼组织得以复活。但是，这一时期建立的右翼组织领导人多为新生的“战后派”，他们具有极强的反苏、反共、亲美特征。当时的盟军和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不惜借用右翼组织甚至“暴力团”的力量来对付左翼。这些反共右翼组织如：日本革命菊旗同志会（1947）、大和党（1948）、新锐大众党（1946）、大日本爱国党（1951）等，他们为了讨好美国，打着“反共民主主义”的旗号，全然不顾战前传统右翼的“道统”并开始支持保守政权的亲美路线，一改右翼反美、反体制的传统路线。

“战后派”领导的右翼组织活跃期间，正直“战前派”传统右翼组织领导人

^① [日] 堀幸雄著《右翼辞典》，东京：三嶺书房，1991年，第382页。

被流放之时。流放解除后，战前派领导的右翼组织得以恢复。但是，新旧右翼组织之间产生对立。战前派右翼无法容忍美国强加的宪法，主张自主制定宪法，重新武装。战后派右翼则表示对新宪法给予一定的理解，甚至还有人表示反对重新武装。战后日本右翼组织结构变化的特点是，组织分散，流动性较大，各自为政，缺乏有机结合与统一领导。从地域分布上看，41.6%分布在东京，11.5%分布在大阪，5.5%分布在京都、福冈，4.2%分布在神奈川。进入70年代后，日本经济得以自立并迅速发展，右翼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又以更强烈的波峰冲击着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战后右翼运动的最大变化是“新右翼”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试图恢复传统右翼的“道统”并主张革新、自立、弘扬民族传统，其影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右翼”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民族派”色彩强烈。主要有生长之家学生会全国联合会、日本青年协议会、一水会、日本学生同盟、大日本赤诚会、新生亚细亚青年集团、反宪法学生委员会全国联合、国家社会主义者同盟、四宫政治文化研究所、国防问题研究会、兴亚青年协议会、新民族主义青年同盟、三岛由纪夫研究会等。这些新右翼组织与战后初期的亲美、反共、反华的右翼组织不同，他们追求思想上的主体性，主张回归传统、恢复右翼“道统”。新右翼制定的路线与战后初期的“亲美反共”路线有所不同，“一水会”是新右翼的代表性组织，铃木邦男是新右翼理论的代表人物。1972年3月铃木邦男在东京组建了“一水会”，这是新右翼正式登上战后日本政治舞台的标志。他们提出“打倒YP体制”（Y指雅尔塔协定；P指波茨坦公告）的激进口号，主张“回归日本民族”、“反体制、国家革新”，并与战后初期的亲美右翼组织划清了界限。新右翼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政治理念反映了当今一部分日本人的民族诉求，其影响不断扩大。

“宗教右翼”形成于70年代中期，主要有生长之家、神社本厅、靖国神社等。宗教右翼与以前的右翼组织有所不同，他们组织严密、资金充裕并具有高超的活动手法。宗教右翼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发动群众”，如在推动元号法制化的过程中，生长之家与神社本厅、日本遗族会协作，首先设法使“元号法”在地方议会通过。然后，采取地方包围中央的手法再迫使国会通过。1972年自民党就成立了“关于元号的小委员会”，在右翼组织的推动下以及保守政治势力的配合下，1979年6月日本国会终于通过了“元号法”。

参加“右翼组织”的人一般都来自日本社会下层，文化水平不高，尤其是“行动右翼”，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是从暴力团转过来的。行动右翼惯用游行、示威与诽谤、恫吓等极端手法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他们往往没有什么具体的理论主张，极端排外是其主要特点。为了争取存在的合法性，有些暴力团体转化为行动右翼组织，因此，二者之间的界限有时难以分辨。近年来，经常采取过激行为的行动右翼为了显示自己素质的提高，多自称“民族派右翼”。

右翼组织最“接地气”，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也较大，作为“地头蛇”，他们常常通过操纵相关地区选票来制衡一部分国会议员。目前，日本右翼组织中50人以下的团体占63%，100人以上的团体占15%。超过1万人的右翼团体只有5个。据日本1973~1981年版的《警察白皮书》统计，日本右翼的总人数当时为12万人。到1992年6月，正式统计的右翼、民族派团体大约有840个，总人数约12.5万人。其中，行动右翼大约有50个团体，2万人左右。另据日本《选择》杂志2000年5月号统计，日本的右翼团体数为900个，总人数约10万人。日本右翼组织合法活动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街头宣传，二是提出请愿书与抗议书。近年来，右翼组织活动的“成效”主要表现在：推进了国旗、国歌法制化的进程；对不法官员、品质不佳的企业、金融机构施加压力等。右翼组织在社会不公现象面前，有时确实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在诸如领土问题上，有时却显示出盲目的极端民族主义特征。

二、右翼组织的理念与信条

右翼思想在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作为社会的底层，日本右翼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的呼声。与此同时，不论近代还是现代，右翼组织都不同程度地被右翼政客所利用。现实中，统治阶层的“鹰派”政治家往往能与右翼在思想上产生共鸣。这就是右翼组织能够成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社会基础的根本原因。在近百年的日本右翼发展史上，其阶段性的特征各有不同。战前右翼组织的典型思想理论是天皇主义、日本主义、三反主义、亚细亚主义。战前右翼崇尚以天皇为中心、一君万民的政治制度，对日本自古以来君民一体、以农本主义为特征的国体情有独衷，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吞食亚洲，主张强调东方文化的正统性。

日本右翼的一个永久精神支柱就是天皇，不论这天皇是“实在的”还是“精神的”，也不管他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天皇是日本传统精神“大和魂”的终极表述。日本历朝历代都是利用天皇来整合人们的思想，加强自己的统治。遗憾的是天皇不在右翼手中，而是在西化了的自由主义者手中。所以，右翼要进行“第二次维新”（继续革命），要推翻现政府。即便是北一辉的“革命天皇”思想也还是没能离开天皇。日本主义、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农本主义、亚细亚主义、反共产主义、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反体制是右翼思想的精髓。

右翼思想与天皇制难解难分，甚至将天皇神化，这是日本右翼区别于他国右翼的显著特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天皇自己撩开了“神”的面纱回到人间。右翼的精神支柱随之倒塌。但对于右翼来讲，天皇是作为“思想”和“理念”而存在的。所以，即便是在战后的“象征性”天皇体制下，右翼仍然将天皇奉为神明。他们要求“将统治权还于天皇”、“把被占领政策以及欧美毒害

了的祖国清洗干净”，认为这是“神国”日本赋予右翼的使命。战后日本右翼所追求的是“主权在君”的立宪君主制国家，他们希望天皇能成为日本民族的元首。革新派右翼组织心目中的国家主体是日本民族而非天皇，这与国粹派右翼组织的思想差别很大。80年代以来，右翼势力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结合使右翼获得“新生”，同时，右翼对日本政局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带有“民族派”色彩的“新右翼”，^①其理念、思想与“民族派”政治家、退職高官及知识人的理念思想越来越能找到共同语言。

所谓右翼的“道统”是指，对内坚持与腐败的政党、阻碍国民自由与平等的官僚、垄断利润的财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对外主张亚细亚主义。这是战前日本右翼在对内、对外认识上的一个特征。变革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现行体制、实现亚洲国家的维新是战前日本右翼的美好理想。因此，当时的日本成为培养亚洲革命家、维新派的摇篮。随着战后美苏冷战体制的形成，日本反苏、反共、亲美的右翼组织被扶持，他们一改右翼反美、反体制的传统方针路线，成为政府的“别动队”。日本右翼虽然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但是，右翼组织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战后，日本右翼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国内，但是，在遇到重大内政外交事件时还是能即刻倾巢出动。在教科书问题、领土问题、修宪问题上，他们总是反应强烈，动辄上街游行，对日本政府决策施加压力。除了直接的抗议行动外，右翼组织还通过各种方式向政界渗透。有的右翼组织领导人与政治家过从甚密，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当右翼组织与右倾文人以及右派政治家在思想上产生共鸣时，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态势就将形成。

1976年，推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运动的右翼团体“慰祭英灵会”成立，十年后的1986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二战后第一位以现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总理。1972年5月，右翼组织为了表示对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反对，首次登上钓鱼岛。1978年8月，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设置了灯台，1988年6月又更换为太阳能新灯台。从1996年7月下旬开始，右翼组织还网罗了约420个右翼团体，动员了1520人，约430台街头宣传车就有关中日领土争议问题进行抗议游行。修宪是日本右翼最大的战略目标，为达此目标右翼势力于1981年10月27日成立了“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该组织的活动手法是“发动群众”，诉诸舆论，即开展“草根”保守运动。他们企图通过控制国民投票来影响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最终实现在国会通过修宪议案。修改宪法，拥有军队，实现海外派兵，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是该组织的奋斗目标。

^① 王屏 《解剖日本“新右翼”》，北京《人民日报》（环球走笔），2010年9月7日第22版。

三、不是右翼的“右翼”

经过战后 70 年的民主政治洗礼，右翼组织的活动和影响都在缩小。作为右翼势力主角的右翼组织，其作用和影响逐渐被右倾文人和右派政治家所取代。在日本，右倾文人和右派政治家因其未参加固定的右翼组织而不被称作“右翼”。但是，他们的言行往往比右翼组织还右，而其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右翼组织更大。

（一）“右倾文人”为日本社会向右转“启蒙”

所谓“右倾文人”是指那些在人文社科以及新闻媒体领域活动并经常发表带有右翼倾向的文章、演说的知识人。他们多聚集在大学、报社以及各类智库当中，或著书立说或提出政策设想，影响舆论导向和政府决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智库、智囊以及智囊团在推动日本社会右倾化的过程中，其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右倾文人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分散在民间的小型右翼智库以及各大学及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当中；另一部分是官方或半官方智库以及临时组成的首相智囊团当中带有右倾政治色彩的“有识之士”。前者虽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有限，但他（她）们通过演讲、出版书籍以及提供报告书的方式来影响舆论和民意。在这批人当中，有很多反华、仇华分子。如：石原慎太郎、古森义久、冈崎久彦、中西辉政、渡部升一、平松茂雄、樱井良子等。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行严重地恶化了中日关系，对此我们必须严密关注并予以回击。后者一般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官方或半官方大型智库成员以及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他们的讲演或政策建议往往受到各方关注，特别是首相或政府组建的智囊团所提出的报告书，往往能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可以说，右倾文人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右倾文人”舞文弄墨，煽风点火，误导民意，污染社会环境，其对日本社会的危害程度远大于右翼组织。右倾文人为日本政治右倾化制造舆论，并期待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能被决策层所用。但其政策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受政府重视，社会影响力也一般。在遇到右派领导人当政时，他们便劲头十足，争先恐后地为政府“献计献策”，唯恐天下不乱。“右倾文人”往往通过著书立说，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例如平松茂雄在《中国吞并日本》一书中危言耸听地说，未来东海将成为中国的“战略边疆”，以此为据点，中国将把台湾、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认为，日本要么“屈服于中国”，要么“显示与美国坚固的同盟关系”。1997年，石原慎太郎在《诸君》杂志上著文，诬蔑中国加强军备就是要最终独自开发钓鱼岛海域的油气田。“购买钓鱼岛”更是他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华战略的一部分。

樱井良子在《中国—另类的大国》一书中为政府支招说“日本政府应在强调最大限度地重视日中友好的同时，悄悄地向尖阁列岛（钓鱼岛）派驻自卫队。

对于中国的抗议，日本政府应以‘这是国内问题，请不要介入’而冷言相对。同时，以笑脸摆出不断地呼吁为使东海变成和平之海而共同合作的姿态。”^①她还批评外务省主导的对华外交是“彻头彻尾地忘了国家利益”。右倾文人的所谓预测和政策建议虽然不等于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但是，在那些右倾文人的煽动下，舆论导向甚至政府决策都会误入歧途，民意也会向非理性方向发展。因此，右倾文人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恶劣作用，同时，他们对政府外交决策造成的巨大压力也不能低估。

（二）“右派政治家”引领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

“右派政治家”（包括一些右翼政客）一般指那些持有明显右倾保守立场的国会议员。即人们常说的“鹰派”、“新保守派”、“民族派”、“国防族”等，其中不乏反华、反共的右翼政客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当然，右派政治家当中既有为“国家利益”和“民族自立”而奔走之人，也有为特定国家和组织服务并针对一些国家和组织而不择手段搞阴谋之人。右派政治家们常为“公利”和“私利”去组织类似于智库的团体，这些团体虽然大多不具备法人资格，但为影响政府决策和引导政治右倾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做了舆论准备。

战后日本的三次右倾化都是在右派政治家的引领之下进行的。与战前相比，战后日本政治相对说来向左转。但是，随着美国世界战略的变化，日本对于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也在进行适时调整。战后初期，从战争废墟中走出的日本，经过“左翼春风”的吹拂，在美国“民主化改造”过程中获得重生。然而，进入5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构的形成，日本政治迎来了战后第一次右倾化浪潮。这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对美一边倒”，方法就是用主权换经济，并实现了走向“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进入80年代的日本将“政治大国”作为自己战后追求的第二个国家战略目标。伴随这个目标的追求，也给日本政治带来了第二次政治右倾化的结果。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东亚战略目标的重新界定，日本也开始了其走向“军事大国”的第三个国家战略目标的追寻过程。同时，日本也向亚洲和世界展现了其开始战后政治第三次右倾化的过程。

战后日本政治第一次右倾化过程自“旧金山和约”签订开始至1960年日美“新安保条约”签订为止。如果说民间右翼组织的对美“一边倒”只是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那么，在执政的保守党阵营中，政治家则分为“主流保守派”和“非主流保守派”（即“鹰派”）。前者想通过制定具体的内外政策配合美国东亚战略的实施以期达成战后日本第一个国家战略目标——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而鹰派（又分为亲美的岸信介和亲苏的鸠山一郎）则不满主权丢失，岸信介想在日本安保条约框架内为日本多争取点利益，鸠山则主张自主制定宪法，自主防卫，夺回主权。其实，战后日本政治第一次右倾化过程中的主角构成很

^① [日] 櫻井良子著 《中国—異型の大国》，东京：新潮社，2008年，第133页。

复杂。前期，民间的“战后派”领导的亲美右翼组织和执政的保守政党中的“主流保守派”（吉田派）发挥了作用，后期，复归的“战前派”领导的传统右翼组织和保守政党中的“非主流保守派”（鸠山派）发挥了作用。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当时之所以牺牲日本的独立与防卫都要与美国妥协，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日本的衰败重新走向“经济大国”。

另外，作为战后日本右派政治家的典型代表，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面对来势汹涌的“反安保”群众运动，不顾一切地要修改旧安保条约就是要为日本争得一点自立的权力，不过，他是通过亲美反共的方式进行的。鸠山一郎对日美同盟使日本丢失防卫权耿耿于怀，他通过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向美国示威。50年后，鸠山由纪夫为了完成祖父的夙愿而主张“日美对等”，但以失败告终。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两次出任日本首相，都在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但他也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慢步小跑。

80年代初，日本终于完成了走向“经济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随着中曾根康弘“战后总决算”号角的吹响，“新保守派”登场，并确立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战后日本政治第二次右倾化也随之展开，其口号是争做“国际贡献”，目标是走向“正常国家”。本次右倾化的右派政治家代表人物是中曾根康弘和小泽一郎。作为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不仅参拜了靖国神社，还提出军费超过GDP1%的主张。“教科书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激化的，日本与周边国家摩擦加剧。与此同时，日本的离美倾向产生。无疑，“新保守派”、“民族派”、“国防族”是这次政治右倾化的主角。矫正“吉田路线”，改革战后体制，修改宪法成为“新保守派”追求的政治目标。

1981年10月21日，有280名议员参加的“自主宪法期成同盟”（会长岸信介）发表了“第一次宪法修正案”，鼓吹部分修改日本宪法。1982年5月“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又召开研讨会，在公开场合挑起关于修宪的大论战。同年11月，“修宪派”中曾根康弘登上总理宝座。1983年1月，在自民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通过“修宪决议”。1985年11月，自民党抛出了修改宪法的“新政策纲领”，主张，“我党历来将自主宪法的制定即自主地修改宪法作为立党之本。今后将继续坚持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則，随着时代的变迁推进对现行宪法的修改及探讨”。

战后日本政治第二次右倾化的特点不是亲美而是“自立”，这也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美国看出了日本的离心倾向并开始给日本适当松绑。90年代末的日美同盟“再定义”以及“日美合作新指针”的出台就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结果。“PKO法”、“周边事态法”以及“有事法”的通过，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并使“日美同盟”从本土扩展到地区乃至世界提供了法理依据。也为日本实现“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奠定了法理基

础。经过世纪之交前后的努力（小泉纯一郎在此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是，没有独立防卫权的政治大国是虚弱的。

于是，实现“军事大国”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任务就落到了安倍晋三肩上。^①战后日本政治第三次右倾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就是保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被挤压，但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插足力不从心，只好让盟国为其分担责任。由于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最重要伙伴，在尽义务的同时日本也获得了走向“军事大国”的契机。通过“反恐特措法”，日本走出国界，为美军进行后方支援。日本虽然被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但获得了从“专守防卫”向“动态防卫”转换的战略机遇，日本终于在防卫政策上获得突破。通过21世纪初这十多年的努力，日美同盟从岛屿防卫走向了“世界范围内的日美同盟”，安倍也在为“到达地球的另一边”做准备。如果说中曾根康弘与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哲学思考，那么，安倍晋三的“新日本主义”^②以及麻生太郎的“自由与繁荣之弧”设想就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理论依据。

日本追求军事大国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一个是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对于前者，日本通过“解释修宪”，使“武器出口三原则”成为废纸，“无核3原则”也变成“无核2.5原则”。行使“集体自卫权”只是个如何解释的问题。日本正在设法向国外出口武器，推动国内军工企业的发展，“和平宪法”的核心内容被一步步掏空。对于后者，从鼓吹“自由与繁荣之弧”试图包围中国到鼓吹“中国威胁论”给自己实现“军事大国”目标找借口，都清晰地展现了日本的军事战略意图。

其实，日本走向“自立”的障碍不在中国而在美国。日本的右派政治家以及右倾文人们为了在国内减少推进军事化的阻力而拿中国说事，美国则试图通过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而保留驻日军事基地并促使日本多为美军掏钱。总之，战后日本政治第三次右倾化态势不仅形成，而且正在加快其步伐，其目标就是走向“军事大国”。与前两次右倾化相比，这次来势更加凶猛，步伐更趋稳健，意志更显坚定。当然，“和平宪法”在法律上的制约作用还存在，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也不能低估。同时，我们在批判日本右倾化的过程中，也要正确地区分日本国民对于民族自立的合理诉求与右派政治家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之间的差别。

[收稿日期：2016年09月19日]

[修回日期：2016年10月20日]

[本文编辑：顾名玥]

① 王屏 《安倍引领战后日本“第三次右倾化”》，北京《环球》（外交洞察），2013年第10期。
② 王屏 《“新日本主义”新在何处》，北京《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06年10月18日。

building regional values and security norms.

Keywords: East Asia; security; the South China Sea;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uthor: Wei Ling ,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The Synchronic Study on the Discourse Energy of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Shen Rong Wang Jianting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scourse energy of the western forc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 and finds that they rely on the logically wrong absolute synchronic discourse and interpret China's South China Sea claims in the translationese way. While the dotted lines is an adaptation to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by China in the meantime of maintaining the purpose and the valu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 which presents the difference seeking in comparative synchronic.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ruling by the arbitration tribunal is not only logically defensible , but also weak and feeble in expressing the values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Keywords: synchronic; discourse energy; monism; differenc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Authors: Shen Rong ,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Marxism ,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Wang Jianting , professor and master's instructor of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How to Differentiate “Japan's Right-Wing”

Wang Ping

Abstract: To study Japanese politics and to graspe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it is better to deeply study Japan's right-wing. In recent years , the right-wing constant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us , we especially should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Japan's right-wing.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right-wings , Japan's right-wing is more complexly constituted and various belief-held. The inner organization of Japan's right-wing includes the “quintessence faction” , “innovation faction” and “knight-errant faction” before the world war II and is divided into action faction , new faction and religious faction after the war. More importantly , be-

sides the right-wing groups , there arises a group of right-leaning literati and right-wing statesmen (including right-wing politicians) , who exerts bigger influence on Japan's society ,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an right-wing groups , and even directly driv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Japan. We should handle its political thoughts and governing philosophy well in a timely manner whether it is reasonable national appeal or extreme nationalism.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Japanese right-wing organization constitu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 the paper objectively defines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the "Japan's right-wing".

Keywords: right-wing groups; right-leaning literati; right-wing statesmen; right-leaning of Postwar Japan politics for three times

Author: Wang Ping , Ph. D. and professor of Japan Politics Research Subdivision in Japanese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Maritime Nations Alliance Strategy"

Qu Caiyun

Abstract: Since the modern times , to ally the maritime nation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Japan not only has a history of diplomatic trajectory of the Japanese-Anglo Alliance , but also has the reality of diplomatic base axis of the Japan-US Alliance. After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Japan's "maritime nations alliance strategy"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 it presents very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Firstly , the objects and partners of the Japan's alliance focus on the world hegemony and power-oriented as the key and the dominant , and gradually expand to the regional powers and nations sharing the common values. Secondly , China has become the main target of Japan's "maritime nation alliance strategy" containment. Thirdly , to expand sea power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Japan's "maritime nation alliance strategy" pursuing. Fourthly , to build a "alliance system of maritime and democracy nations" which is based and centered on the "Japan-US alliance" is the pattern of Japan's "maritime nation alliance strategy".

Keywords: Japan; maritime nations alliance; Japanese-Anglo Alliance; Japan-US Alliance; sea power

Author: Dr. Qu Caiyun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and Global Strategic Research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